



中國
教育
新編

ZHONGGUO
JIAOYUSHI
XINBIAN

中国教育史新编

王建军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ZHONGGUO
JIAOYUSHI
XINBIAN

中国教育史新编

王建军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教育史新编/王建军著.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
ISBN 978 - 7 - 5361 - 5116 - 1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教育史 - 中国 IV. ①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7109 号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编：510500 营销电话：(020) 87553335 http://www.gdgjss.com.cn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480 千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中国传统教育的产生	
——先秦时期的教育 ······	(4)
第一节 教育的起源和原始教育 ······	(4)
第二节 从“学在官府”到私学兴起 ······	(6)
一、我国古代学校的产生 ······	(6)
二、夏、商、西周时期的官学教育 ······	(8)
三、春秋战国的私学兴起 ······	(13)
四、稷下学宫 ······	(20)
第三节 先秦时期儒家的教育思想 ······	(21)
一、“为政以德” ······	(23)
二、“有教无类” ······	(27)
三、“为己之学” ······	(31)
四、“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	(36)
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	(38)
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	(40)
第四节 墨家、法家、道家的教育观 ······	(48)
一、墨家的教育观 ······	(48)
二、法家的教育观 ······	(51)
三、道家的教育观 ······	(55)
第五节 《学记》的教育思想 ······	(60)
第二章 传统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秦汉至隋唐的教育 ······	(63)
第一节 文教政策由单一走向多元 ······	(63)
一、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 ······	(64)
二、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	(66)
三、魏晋南北朝文教政策的多元趋向 ······	(73)
四、隋唐儒佛道并重的文教政策 ······	(76)

第二节 学校制度由单一趋于多元	(79)
一、汉代的学校制度	(79)
二、魏晋南北朝学校教育的新发展	(83)
三、隋唐学校制度的完备	(100)
第三节 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创立与改革	(103)
一、察举制的创立和发展	(103)
二、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及其流弊	(105)
三、科举制的产生	(107)
 第三章 传统教育制度的成熟与僵化	
——宋、元、明、清的教育	(110)
第一节 宋、元、明、清文教政策的专制化趋向	(110)
一、宋代的文教政策	(110)
二、元代的文教政策	(114)
三、明清的文教政策	(118)
第二节 宋、元、明、清官学制度的单一化趋向	(122)
一、北宋的三次兴学	(122)
二、两宋的官学教育制度	(125)
三、元代的学校制度	(126)
四、明清的学校制度	(129)
第三节 科举制度调控机制的加强	(137)
一、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137)
二、元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138)
三、明清的科举考试制度	(138)
四、科举制的作用和影响	(140)
第四节 蒙养教育的伦理化趋向	(142)
一、中国古代蒙养教育的目的	(143)
二、中国古代蒙养教育的内容	(144)
三、中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编写	(149)
第五节 书院发展的官学化趋向	(152)
一、书院产生的原因	(152)
二、书院管理体制的演变	(153)
三、书院的教学管理制度	(159)

第四章 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过渡

——晚清时期的教育改革	(166)
第一节 晚清教育改革因素的孕育	(167)
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教育主张	(167)
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	(174)
三、太平天国教育的新鲜色彩	(176)
第二节 晚清教育改革的起步	(181)
一、洋务教育的开展	(181)
二、洋务教育过程中的论争	(185)
三、奕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教育改革主张	(194)
四、张之洞的《劝学篇》	(201)
五、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评价	(208)
第三节 晚清教育改革的深入	(211)
一、维新运动的兴起	(212)
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主张	(217)
三、晚清教育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	(229)
第四节 清末新教育体制的建立	(232)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232)
二、科举制度的废除	(234)
三、清末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	(235)
四、清末教育宗旨的颁布	(237)
第五节 西方教育科学的传入	(239)
一、西方教育科学传入的启蒙期	(239)
二、西方教育科学传入的兴盛期	(246)
三、清末西方教育科学传入的特点	(262)
第六节 教会教育的扩张	(275)
一、“孔子加耶稣”	(276)
二、“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拯救中国”	(278)
三、“训练着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	(280)

第五章 中国现代教育的探索

——民国时期的教育发展	(284)
第一节 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	(284)
一、颁布教育宗旨	(285)
二、“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	(288)

三、民国初期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与改革	(292)
第二节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教育改革	(293)
一、复古主义教育思潮的泛起与破灭	(294)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追求	(296)
三、1922年学制的颁布	(310)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整顿	(314)
一、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整顿的基本思路	(314)
二、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出台	(318)
三、教育行政机构的嬗变	(324)
四、以立法形式规范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	(326)
五、学生管理的训育军事化	(331)
六、管、教、养、卫合一的国民教育制度	(333)
第四节 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建设	(335)
一、共产党人的教育功能观	(335)
二、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338)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的提出	(341)
四、革命根据地教育实施的基本原则	(344)
五、根据地干部学校的办学精神	(348)
第六章 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素质教育之路	(358)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发展阶段说	(358)
一、二分法	(359)
二、三分法	(359)
三、四分法	(360)
四、六分法	(361)
第二节 培养目标素质定位的演变	(361)
一、定位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积极成员”	(362)
二、定位在“社会主义劳动者”	(364)
三、定位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370)
四、定位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	(378)
五、定位在“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81)
六、简短的思考	(386)
后记	(388)

绪 论

在汉字的构造中，“教”之字形表达了老一代督促下一代在人类文明引导下成长的含义，《说文解字》析为“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其含义侧重于对下一代进行文明的启蒙和智慧的培养；“育”之字形表达了分娩的含义，《说文解字》析为“育者，养子使其从善也”，其含义侧重于对下一代身心的养育。“教”、“育”二字连用首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人为万物之灵，能够以己之力去引导和帮助他人的成长，这在孟子看来是人生很有价值的事。

孔子有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①就是说，人之降生，上天所赋予各人的素质并没有多大差别，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职业的不同，身份的不同，地位的不同，乃至精神追求的不同，完全是由于后天学习的结果才导致的。孔子的这句话看似平常，其实表达了这样一种教育理念：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大自然赋予了人们平等的教育权利。这个观点从人的自然属性或自然资质中获取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根据，从而获取了教育平等的理论根据。孔子强调人的发展是后天的结果，圣人与小人不是天生的产物，因而人人都有发展自己的权利与资格。这在“血统论”盛行的时代无疑是一种思想的解放。

孔子的这个观点在春秋战国时期引起了思想家们的广泛兴趣。性是什么，人性为什么能够发展，怎样才能发展人性，这些问题一时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告子强调性的自然属性，他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②。庄子也是持这种观点：“性者，生之质也”^③；“人不知其然，性也”^④。他们意在强调人性的天然和平等。孟子则进了一步，他主张性善论，赋予了性以道德含义，他认为能否扩充这种善性取决于后天的教育，“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⑤。荀子则索性将先天之

^① 《论语·阳货》。

^② 《孟子·告子上》。

^③ 《庄子·庚桑楚》。

^④ 《庄子·则阳》。

^⑤ 《孟子·公孙丑上》。



“性”与后天之“伪”区分开来：“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①；人的发展就是先天之性和后天之伪结合的结果：“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②

教育理论的探讨走到这一步，“教育”的定义便渐趋明朗。《礼记·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中国历史上赋予“教育”的第一个定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自然所赋予人的就是“性”，循性而行、率性而为就是“道”，把这种道加以修明并推广于众人就是教育的功夫。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就是传道，而传道的目的则在于更好地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发展人性。

由此可以说，注重自然，注重传道，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基本特色。

中国传统教育注重自然，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所致。从文化学角度看，人类文化，是一定地理、一定气候条件下特定的人类群体为适应自然、求得生存的一种设置。中国的地理环境，西边和北边群山环抱，东边和南边则是浩瀚大海。在古代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古代中国人难以突破西边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和青藏高原这些天然屏障，以及东南面大海的阻隔。但古代中国人所赖以生存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则地域辽阔，地势平坦，河汉纵横，气候温和。这样的地理气候条件促成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早熟，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色彩。

钱穆先生曾经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钱穆先生认为，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而这两类文化表现为流动的、进取的；而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而这种文化表现为静定的，保守的。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耕文化。“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③

① 《荀子·性恶》。

② 《荀子·礼论》。

③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钱穆先生此论，至少有一点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即中国传统文化相当重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远古时期流行的图腾崇拜、敬神祭天，到后来流传的羲和生日月、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不仅反映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而且表现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一种紧密的天然联系，充满着人类希望能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期盼。

这种期盼，催发了人们对“天人相应”的探讨，这便是“道”的问题了。“道”本来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但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站在不同的角度，抱着不同的目的，便会有对自然规律的不同看法，由此也就有了不同的天人观，于是就有了不同的“道”。

“道”不同，对人性的看法便不同，对人性发展的要求也不同。本来，求“道”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注重自然，尊重人性。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主观的偏差，甚或专制政治的需要，乃至统治者个人的好恶，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使“道”偏离自然，误导人性。

“道”不同，对人性的发展便有了不同的“顺”法，不同的“和”法，不同的“安分”法，不同的“守己”法，这便是“教育”的问题了。韩愈的“传道，授业，解惑”确实是点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本质，传道是本，有什么样的“道”，就授什么样的“业”，就解什么样的“惑”；有什么样的“道”，就有什么样的“授业”法和“解惑”法。

这种现象不独古代社会存在，近代社会以来，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反反复复，都是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而展开的。

因此可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进程就因着这“道”的变化而演变。

因此还可以说，任何时期的所传之道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是衡量和评价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根本尺度。



第一章 中国传统教育的产生

——先秦时期的教育

“先秦”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先秦指秦朝以前的历史时期，包括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三个阶段；狭义的先秦则特指春秋战国时期。本书的先秦概念取广义的含义。这一时期的教育发展主要体现为学校制度的产生与传统教育理论的产生两个方面。在这个时期，学校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官府走向民间，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过程。学校教育的独立化促使私学大师们开始探讨教育与教学的规律，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为这一探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的教育家们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阐述教育的主张，从而促成了传统教育理论的产生。

第一节 教育的起源和原始教育

教育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它直接起源于人类传授生产劳动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需要，直接起源于人的发展需要。对这一观点予以强调之所以必要，在于我们对教育产生的本原乃至教育的本质的认识，必须要落点在促进人的发展这一基点上。“整个历史表明，教育是主动的。教育的这种主动性来源于它把人的发展作为自己基本的功能，其他功能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都是基于教育所实现的基本功能。”^①

早在一百多万年以前的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之上，并且在长期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产生了原始的教育活动。

我国的原始社会，大体可分为“原始人群”、“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从我国已经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或遗址测定，我国在一两千万年以前已有古猿活动，在一百多万年以前古猿已进化到猿人阶段，他们几十人一伙，结成原始人群，这便是最原始的社会形态。猿人经

^① 张楚廷：《教育学属于人文科学》，载《教育研究》，2011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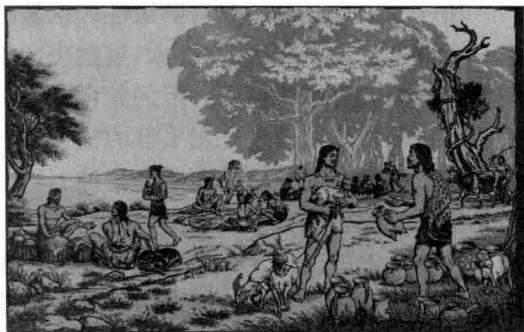
过几十万年进化到古人，再发展到新人。大约距今 5 万年前便开始形成母系氏族公社制度。又到了距今 5000 多年前，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极其低下，自然环境又极为艰苦，所以原始人的生活条件也就极端艰难。一般来说，他们的寿命都很短。考古学家研究了 40 多具北京猿人的化石，其中 40% 的人未满 14 岁便已死亡，可见当时生存环境的险恶。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单个人都无法战胜自然界的困难和毒蛇猛兽的威胁。原始人只有结成集体，靠着共同劳动的群体力量，才能猎取或采集最低限度的食物以养活自己。正是这种互相协作、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需要，使教育成为原始人争取生存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

人类初始的教育活动是十分原始的。那时还没有文字，没有学校，只是靠着人们的口耳相传和模仿练习，年长的一代将人类积累的生活和劳动的经验传授给新一代。他们教育后代如何制造和使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如何互相团结进行集体的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活动，如何寻找和保存天然的火种，如何维系群体部落的团结和安全，如何遵守群体内部的道德规范、风俗以至习惯法等。原始人群在长期艰苦的集体劳动和生活的斗争中，改造着自然和他们自己。

原始的教育活动多是在人们的劳动和生活中进行的。通过生产劳动，年长一代向新一代传授了取火、制造工具的知识，传授了原始工艺技术，教给他们制造石器、骨器、陶器的本领，教给他们纺织、造房、造车船的本领。通过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年长一代向新一代传授了群体部落的道德、风俗、礼仪和习惯法。如氏族公社期间，有氏族成员生前居住、死后埋葬的规定；有先是族外婚、后是对偶婚的规定；有实行民主议事、选举的规定；有敬重祖先、图腾信仰的规定等。这些知识的传授，使氏族的每一成员明确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且，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歌谣、谚语、故事、神话、游戏、舞蹈、雕刻等文艺活动形式也产生了。这些原始民俗活动也就成了教育的重要形式。

原始教育活动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式，那就是原始宗教活动。原始宗教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原始时代盛行



原始社会



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但在这些崇拜中，也包含有教育的内容。比如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其中就包含了自然常识的教育内容。宗教巫术的推广，也需要借助一定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知识，这就使得宗教活动在客观上产生了教育作用。而且，原始宗教活动的举行，对增强氏族部落的凝聚力也是十分有利的。

人类初始的这种教育活动尽管十分原始，但毕竟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它的原始性是受原始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反过来，它又对原始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给予了很大的影响。总体上讲，原始教育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原始教育不具有阶级性。这是最本质的一个特点。原始社会是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的社会，这就决定了其教育不具有阶级性。这一特点主要表现为人人平等地受一定的教育，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一特点也表现在用平等的精神去教育青少年一代，即教育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精神。

第二，原始教育不是一项专门的社会活动。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原始社会里不仅没有从生产实践中分离出来，而且也同政事、宗教、艺术的活动密切结合在一起。没有专门人员和专门场所实施教育。肩负教育责任较多的是老人，因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经验都较丰富。加之氏族公社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老人自然就成为氏族公社的核心人物。

第三，原始教育以口耳相传和模仿为主要手段。那时还没有文字和书本，所以对于生产经验的传授，对于群体部落习俗和习惯法的传递，对于道德品质的培养，都是一面靠口耳相传，一面靠观察模仿。歌谣、谚语、神话、游戏、冠礼、图画等也都是原始教育的重要手段。

原始教育的这些特点，表现着教育的原始性。

第二节 从“学在官府”到私学兴起

一、我国古代学校的产生

教育之逐步成为一项专门的社会活动，最早萌芽于夏朝前后。

《孟子·滕文公上》中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以共之，皆

所以明人伦也。”

《礼记·王制》中也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

这些话互相有些出入，它们代表了战国时期人们的不同看法。但有一点看法却是相通的，即都认为自夏朝前后开始有了专门的教育场所。

夏朝前后出现学校绝不是偶然的。学校教育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据古书记载，原始社会末期出了尧、舜、禹三位圣人。他们先后担任部落首领，采用的是“禅让制”。大禹得位是由于他治水有功，有着“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誉。统治天下之后，依然“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而他的儿子启则“淫溢康乐，野于饮食”。按禹的意思，是要将王位禅让给伯益，而以启为吏。“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①，建立了夏朝。从表面看，启夺取政权只是一种权力之争，然而实质上，启之可以挥霍无度，说明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的产品已有富余，部落首领对富余产品已经具有支配权，并逐步据为己有，私有制度业已形成，社会也逐步分化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学校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

首先，学校的产生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只有在生产力有较大发展，能为社会提供相当数量的剩余生产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脱离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教育和学习活动。夏朝前后已进入了金石并用的时代。由于青铜器的应用和水利灌溉的实施，使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并促进了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繁荣。社会物质财富的富有，不仅使统治阶级可以不劳而获，而且可以设置专门从事教育文化的人员，对其后裔施教。《尚书·尧典》中所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事情。

其次，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形成，也促进了学校的产生。人类社会形成两大对立阶级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利益和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因而需要将贵族子弟集中起来，设立专门的机构，派遣专门的人员来传授管理国家的重要知识，如天文学知识、数学知识、武艺等。可以说，学校的产生首先是源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学校基本成为统治阶级享受教育特权的工具、学校基本成为古代社会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一个特点。

最后，文字的产生，文化知识的日益丰富，使教育有了更为便利的学习

^① 《战国策·燕策》。对此另有一种说法，禹把王位传给启，遭到益的反对，益被启所杀。参见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工具和更为丰富的学习内容，这样有组织、有计划来传授这些文化知识便有了必要和可能。人类社会发展到夏朝，人类文明也有了长足的进展。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知识也由原始的、感性的形态向理性的、抽象的形态渐变和飞跃。例如天文学知识由最初的观天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发展为观象授时、制定历法等；数学知识也由简单的数形概念发展到演算，有了规矩准绳。其他如医学、道德、乐舞等许多知识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对事物的记录也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逐步发展到文字记事。汉字的基本成熟表现在商代的甲骨文上。而据考古分析，在甲骨文之前可能已有接近成熟的文字了。有了文字便有了知识的积累。这样，知识的传授仅靠人们相互间的口耳相传是远远不够了，仅靠个人的经验也远远不够了。它需要有专门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专门的文化人员来搜集、整理和传授这些知识。学校的产生正好适应了文化教育发展的这种需要。

正由于以上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有了我国古代学校的产生。

二、夏、商、西周时期的官学教育

（一）夏、商、西周时期的学校

学校在开始产生的时候还是很原始的。严格地说，这些被称为“庠”、“序”、“校”的机构都还只是些教育的场所，与今天意义上的学校相差甚远。而且，当时的教育活动也常常是和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这些教育场所实际上还主要是当时国家政治活动的场所，只不过其教育的性质比较突出而已。经过一定发展过程，这些场所才逐渐成为专门的教育机构。比如“庠”，按《说文解字》的意思，“庠”字由“广”和“羊”两部分构成。“广”，即房舍的意思；“羊”，即牛羊的羊。在原始公社的中后期，人类已经由狩猎、采集为主的不定居生活，进入了以饲养、种植为主的定居生



甲骨文（前14世纪—前11世纪）

活。“庠”在原始公社的最初含义，就是饲养牛羊的场所。由于饲养的工作多由老人担任，他们便一边负责饲养牛羊，一边兼管儿童。久而久之，“庠”就由单纯饲养牛羊的场所演变为教育儿童的场所。另有一种说法，“庠”为“食羊者所居处”。在原始社会，羊为美肴，一般只有氏族长老才有资格享用，故“庠”为氏族敬老养老之所。原始社会，教育后一代的任务通常由老人承担，所以“庠”便演变成教育的场所了。这两种说法都说明了最初的学校都不是纯粹的教育机构。

比如“序”，在古代是指练习骑射的场所，因其东西两边有墙，中间是一块空旷的场地，故其字形的偏旁从“广”。从金文的“序”字看，其形酷似人在“广”中拉弓射箭，以表示习射之所。奴隶制时代，部落之间的征伐、掠夺十分频繁，所以奴隶主贵族非常重视军事训练，以便把本阶级的成员及其后代培养成为能骑善射的武士，所以“序”也就成了一种军事体育性质的教育机构。

比如“校”，最初也是一种军事体育性质的教育机构。据《说文解字》解释，“校”字的原意是“木囚”，即用木头或竹子围成围栏作为养马的地方。后来由于统治阶级贵族进行军事训练的需要，又逐渐演变成习武和比武的场所了。在这里，统治阶级贵族及其子弟不仅受到内容相当广泛的军事训练，而且还要经过十分严格的各项考核。据考证，“校”的出现在时间上要比“序”略晚一些，其教育意义则比“序”更大一些。

从以上的介绍来看，这时期的学校还是很粗糙，它们还只是学校的雏形。

殷商时期的学校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地下出土文物来看，殷商的甲骨文不仅有“庠”、“序”等字，而且有了“学”字。“学”字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教育已经开始注重文化知识的学习，而且教学活动也在固定的学舍里进行。此外，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还有像手持笔形的“笔”字，像竹木简扎在一起的“册”字，以及“师”字和“教”字。这些单字的出现，说明商朝已经有了专门进行教学的场所——学校，有了用于教学的工具——笔册，有了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教师。在殷商



甲骨文（安阳殷墟出土）

时期的甲骨文中，还有占卜何时建校、何时入学的内容，有表示习射、习数、习礼和习乐的内容，有反映教师指导学生练习刻字的内容等。

西周的学校教育集前代之大成，汇合各种学校构成一套较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据古籍记载，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与“乡学”两大系统。“国学”有小学和大学两级。小学有两种：一种是设在宫廷附近的贵胄小学，一种是设在郊区的一般贵族子弟的小学。大学也有两种：一种是设在天子所在都城的大学，叫“辟雍”，另一种是设在诸侯所在都城的大学，叫“泮宫”。“乡学”则有序、序、校、塾。“乡学”的设置，是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规划的。古籍中对此的说法不尽相同，《周礼》中说：“乡有序，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礼记·学记》中说：“家有塾，党有序，术有序，国有学。”这些说法虽然含有后人对西周社会的美化成分，但至少可以看出西周的学校制度确实比前两代有了发展。当然，西周的学校制度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普及，它所面对的不过是统治阶级贵族子弟。

（二）夏、商、西周时期学校的教育内容

夏、商、西周时期的学校，其教育目的在于培养统治人才，因而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传授国家管理知识和本领。至此，课程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在原始社会，教育面向所有成员的生存需要，因而教育的内容与生活、劳动紧密结合。至夏、商、西周时期学校的产生，社会统治者从本阶级利益出发，将统治阶级的信条和价值观念都逐渐变成了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并通过学校而保存下来。这时的学校课程已不再体现着人类的生存需要，而首先体现为统治阶级的生存需要，教育的内容便由传授人类的生活本领演变成传授统治阶级的统治本领，有关生活和劳动的内容被排斥于学校教育之外，教育内容开始分化。这一转折决定了古代学校教育内容开始趋于贵族化和特权化，与社会生活和劳动日益脱节和对立。^①

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变化，夏、商、西周三代对统治人才的素质要求也不尽相同，其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就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和完善。夏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外征讨和对内镇压，因而学校教育特别注重习射，以培养武士。商代重视祀与戎，因此商代的学校主要是传授关于祭祀、军事、乐舞和文字方面的知识技能。西周时期是古代礼制初步成型的时期。“周人对于祖灵之保佑依然十分重视，只是他们进一步认为，除了‘天’的意志是价值的终极依据之外，‘人’的感情也是价值的合理依据，于是，亲情及其向外扩展是人际和谐的基础，血缘及其应有的远近分别是社会秩序的

^①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绪论，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